

美国女学者眼里的 中国女性

艾米莉·韩尼格 盖尔·贺肖 著

陈山 延宁 侯玉海 译



图书馆

□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美国女学者眼里的

中国女性

艾米莉·韩尼格 盖尔·贺肖 著

陈山 延宁 侯玉海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Emily Honig & Gail Hershatt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8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IP data appear at the end of the book

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

艾米莉·韩尼格 著

盖尔·贺肖

陈山 延宁 侯玉海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美术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4 插页 215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4975-1/c·152

定价:14.00 元

内 容 简 介

美国学者艾米莉·韩尼格和盖尔·贺肖合著的《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一书以改革开放为切入点，全面记述了1979—1986年七年间中国女性在群体意识、社会观点、道德标准、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婚姻家庭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长达七年的调研中，两名美国女性作者倾注满腔热情，锲而不舍地在这块神秘且神奇的国度里，调查走访，翻阅档案，广收资料，在多方协助下，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部著作。

在父系家庭观念和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谈论女人本就是很忌讳的话题，听美国女人谈论中国女人就尤为稀罕了。《美国女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既讲女人的故事，也讲男人的故事，还讲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它讲现代，也讲历史，还讲现代与历史的撞击。它讲中国，也讲西方，还讲中国和西方的异同。它讲东方道德，也讲西方道德，还介绍女权主义者的看法。总之，它把两个美国女性眼里所看到的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的神秘和神奇、达世和困顿、图新和崇古活生生地推到了我们面前，带我们一道去探索人生、爱情、社会和历史的真谛！

前言

那是展览的最后一天，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展出大厅里人头攒动。成群结队的妇女——偶尔也夹杂有一两位男士——匆匆忙忙地赶着参观“1976—1986 上海妇女成就展”。与此同时，展馆工作人员正在出出进进忙着拆除展品。这次展览向世人展示了妇女在各条战线——农、科、教、体、文艺——所做出的贡献和表现出来的才能，令广大参观者赞叹不已。

展览中虽然没有解放前后中国妇女状况比较方面的内容，但它却清楚地展示了上海妇女生活在 20 世纪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妇女们再也不像封建时代那样仅限于料理家务、生儿育女、做针线活，或供男人取乐了。实际上，妇女活动的范围在民国（1911—1949）时期就已经大大地拓宽了，她们中许多人走出家门去工厂做工，或

从事教学、社会工作、医疗、学生运动、政治活动等。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妇女中参加工作的人数之多就更是史无前例了。除踊跃就业外，妇女们还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当我们漫步于宽敞明亮的展览厅时，处处都可以感到妇女们扬眉吐气的浓郁气息：从展窗里女英雄模范飒爽的英姿里，从参观展览的妇女充满自信的神态和爽朗的言谈中，从举办这样一个展览本身这件事上——政府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公众对妇女在中国发展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的认识。

然而，我们对这次展览仍有两点感到困惑不解。首先，从展出的个别统计数字看来，妇女的地位仍远远不如男子。上海妇女共产党员人数不到全市党员总数的1/4，这对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个把教育看做强国之本的国家里，在上海各大专院校里攻读高等学历的女研究生人数却少得可怜（比如：博士生人数共140名，女生仅50名；硕士生共7753名，女生仅156名）。

再之，展览中有关男女劳动分工方面的内容相互矛盾。它一方面大力宣传杰出的女科学家，另一方面却又暗示人们：妇女在性格和文化修养上特别适合于做像刺绣这样一类报酬较低的工作。展览虽浓墨重彩地礼赞了妇女走出家门后的个人成就，但却未探讨妇女除在外从事有偿劳动之外，还须在家无偿料理家务和养育子女的双重负担问题。

中国公众舆论对妇女地位的看法要比展览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更为复杂。70年代后期以来，报纸上曾就妇女方方面面的问题——从服饰穿戴到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等进行过热烈，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讨论和争论。这些讨论不仅在报纸和杂志上占

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和篇幅，而且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还对公众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在大城市。从五四运动反对偶像崇拜的青年学生们向儒家三从四德的妇女观宣战以来，人们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认真地讨论和思考过社会性别问题。

本书主要讨论 80 年代中国妇女作用的迅速变化，同时也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展望社会前途及妇女未来的社会地位时所表现出来的激动、彷徨和忧虑。本书以年轻妇女踏入社会为滥觞，继而依次讨论了妇女的服饰、性别特点、恋爱、婚姻、家庭关系、离婚、工作、遭受虐待以及男女不平等等诸多问题。中国这类问题的讨论同我国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异曲同工，有时甚至如出一辙。但是他们所采用的讨论模式则带有 20 世纪中国历史和妇女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的明显烙印。

妇女和中国革命 20 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统一、强大和自由的中国的理想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便首先对奴役妇女的社会现象发起了猛烈抨击。在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孔孟之道及建立于其上的封建制度，痛斥它们使国家在西方列强面前软弱无力。他们还认为，妇女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是中国文化中造成国家贫弱的诸多原因之一。对爱国的学生来说，妇女的被奴役的地位不仅仅是唤起民众的一张招牌，更重要的是，她们每个人对孔孟之道的危害都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这些学生拒绝遵从父母包办的婚姻，公开讨论爱情的本质，观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并且努力按照现代女性的形象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创建者们接过了五四传统。从1921年建党以来，该党就提倡妇女解放。但从30年代起，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斗争，妇女解放工作只能服从于党的总目标。反对虐待妻子和禁止包办婚姻的运动只能因势利导，否则便会失去农民的支持。共产党虽然成功地改造了农村根据地内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但却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只有让妇女从事有偿的工作，才是争取她们自身解放的关键。他们之所以将“妇女问题”界定得如此狭窄，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性别；其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尽量减少磨擦并最大限度增加生产乃是中国社会生存的关键。

从1949年执政以来，共产党处理妇女解放问题的方式基本上沿袭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妇女工作的经验。1950年颁布的宪法保障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同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妇女择偶和要求离婚的自由。妇女们再也不用缠足，这一沿袭千年的陋俗即使在偏僻的山村也被彻底根除。女孩子至少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为了保护妇女的权利，政府还成立了妇联组织。不过，革命胜利之后，动员妇女的目的并不单单为争取男女平等，而是要她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会带来妇女的解放。社会性别虽然不再是人们日常议论的话题，但是在妇女作用问题上的冲突却在许多方面对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譬如，在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中，参加劳动的妇女人数之众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中（1966—1976），阶级斗争挂帅，其他一切问题——其中包括男女平等问题——都被搁置了起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了全面混乱：学校关门，机关单位停

止办公，政治分歧升级为武斗，青少年成群结队到全国各地搞串连、闹革命。

由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评价分歧严重、尚无定论，所以很难估价它对妇女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虽然“妇女能顶半边天”一类的标语口号和英姿勃勃的女工人、女农民的宣传画比比皆是，但政府部门却很少过问实际存在着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更不用说采取措施去消除它们了。事实上，那时如果有人胆敢把社会性别问题同阶级斗争并列起来，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妇联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被解散了，许多妇联领导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妇女干起了许多以前从未干过的工作，但她们的家庭职责却并未因此发生丝毫变化。她们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挑起两副重担。复杂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被简化成一句话，那就是：家里家外都要政治挂帅。

然而，尽管政府对妇女问题很少过问，但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的生活仍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影响。虽然“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很大，但它却赋予了年轻妇女前所未有的活动自由。年轻的女红卫兵摆脱了家庭的羁绊，去全国各地串连。她们串连人数之多，她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自信和热情是老一辈妇女们所望尘莫及的。然而，迄至1968年城市的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时，这些年轻女子才发现，失去了家庭及亲友的保护，她们便无力抵抗性暴力和其他侵犯她们人身权利的社会势力。不过，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以及和同辈人的交往却赋予了她们许多期待和经历，这些期待和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的夫人江青及其政治同伙被捕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在各个方面被彻底废弃。1978年，经

济改革开始，妇女生活又重新恢复正常。在农村，取消了集体化生产方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鼓励农民搞副业，允许搞自由市场，并且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一系列政策一方面使农村妇女有更多的机会为家庭增加收入，但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的劳动置于家长而不是集体的严格控制之下，扩大了家庭的权力。在城镇，企业自主权得到了扩大，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权聘用或解雇工人。80年代初，由于城市待业青年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所以企业招工时有充分的选择余地。许多企业都随即决定只招男工不招女工，因为妇女家庭拖累多，工作不可靠。这一时期，各类学校迅速增多，但同时各级学校的招生考试也相应严格起来。招生中，由于女生在能力上不及男生这种普遍观念从中作祟，女孩子上学的机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个人积累和炫耀财富得到政府的赞许。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一举动对妇女的着装、对方便省力的家电产品的开发以及对新娘结婚时对家具的奢华要求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一种变化都表明，人们期待着妇女以新的工作姿态和行为方式出现在社会上。

经济改革对妇女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妇女问题一时间成了人们私下谈话和报刊评论的主题。妇女的私人生活所以在80年代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除经济改革这个主要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过去多年堆积起来的问题引起了上到决策者、下到平头百姓的共同关注。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使得政府采取了愈来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从70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就使婚姻家庭关系趋于紧张起来。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给妇女带来了不堪忍受的压力。生育女婴的妇

女往往遭人冷言冷语，出生的女婴有时被溺死或遗弃。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着夭折的威胁。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问题仍不容忽视：许多下乡知青，为了等待回城屡屡推迟婚期，形成了一个大龄、单身、牢骚满腹的社会群体，其中知青找对象的问题尤为尖锐。大量在“文化大革命”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婚姻则开始分化，迫使人们开始思考婚姻的本质和离婚权利等问题。妇女的平等权利虽然在法律上已有保障，但她们在婚姻问题上究竟应有多大自主权则是众说纷纭。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关心个人生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公共政策使得个人问题的讨论成为全社会的迫切需要。

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开放同样也推动了其国内关于妇女作用的讨论。为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开始学习、借用和购买西方技术。外国专家、商人、记者及外交家蜂拥而至，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多年来与西方隔绝的中国读者如饥似渴地观看外国电影，读外国书籍。此外，随着西方技术一同来到中国的，还有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能否和技术分离开，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政界要人还是平头百姓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中国的妇女杂志开始报导西方国家的妇女状况。西方时装、西方家庭模式及性道德观念很快就成了中国公众激烈争论的话题。

老话题 新分歧 80年代中国妇女的状况以及有关她们社会地位的大讨论，在其表现形式上同过去没什么两样，但却不是过去的重演。1949年以前的那个中国以及妇女在那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已成为过去。80年代初虽然再次发生溺杀女婴、繁缛的结婚礼仪以及其他类似现象，乍看起来，似乎像是过去

的回潮。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历史背景下，某些社会问题，如溺杀女婴等，并不是经济改革的本来意图。而且，这些回潮现象一经发现是因国家政策引起的，政府就不遗余力地予以纠正和打击，其成效之明显也是1949年以前中国历届政府所难望其项背的。其他一些传统做法，比如父母包办婚姻等，不仅受到政府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的反对。两代人之间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甚至比五四时期还要激烈和广泛。由于全民族文化程度的提高、通讯手段的改进、公众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广泛参与程度的提高，发生在80年代的这场大争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尽管中国妇女在工作中仍受歧视，在家庭中依然受虐待，但她们可以就此大胆提出质问，这在早年是无法想象的。况且，她们还可以向各级以前未曾有过的相关部门寻求支持。她们可以而且确实也利用新闻界倾诉苦衷，揭露不公正现象，请教疑难问题，表达她们对80年代发生的社会变革的喜悦和苦恼。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有些争论的问题在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但80年代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旧话重提。“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新闻界就曾讨论过以下问题：青少年早恋问题、结婚的年龄问题、晚婚及婚礼从简的好处、婚外恋的不道德、离婚的痛苦以及妇女的劳动报酬和家庭责任等有争议的问题，甚至还讨论过新式服装的适度问题。80年代重提这些中断多年的话题，其提法及言词也的确让那些过来人听来耳熟。但是，由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场讨论也就应运而生。这时，革命同志之间的友谊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多情的妻子所左右的情侣关系。服饰穿

戴和性生活成了公开讨论的话题，这是 50 年代做梦都不敢想的。由于经济改革，妇女的就业问题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同 30 年前比起来更为复杂，而且公众对它们的看法也不像过去那样整齐划一。

在所有这些领域内，80 年代的讨论果断地摒弃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做法。妇女在美化自己方面表现出来的执迷和热情，人们对让妇女回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中去这一观念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以及报刊上对妇女美德的讨论，这些都统统应该被理解为是对“文化大革命”信条的反叛。相反，推行某些有利于消除男女不平等的做法已不可能，因为它们往往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说 50 年代使妇女饱受压迫的罪魁祸首是封建思想，那么，在 80 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做法则首当其冲。

中国报刊上的这些讨论对美国读者来说颇有似曾相识之感。充斥报端的时装介绍、如何引起男性注意的说教、新婚夫妇之间的种种危机以及在处理事业和家庭责任方面的技巧等，这些东西读起来都颇似美国《红书》《大都会》《女士杂志》等杂志刊载过的文章的翻版。

80 年代中国妇女面临的冲突与其他国家妇女曾经遇到的问题相似乃尔。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曾经把那些战争时期动员起来顶替男人工作的妇女打发回家。50 年代一个时期，美国妇女杂志充斥着妇女如何操持家务、如何穿戴打扮、如何养育子女等内容，这同 80 年代中国报刊的情况几乎同出一辙。两个国家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在重建明确的社会性别角色方面做了一定尝试以后，有过长时间的停顿，而且这种尝试在两国都得到了为数众多的男女国民的支持

和赞成。

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西方各国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同样，中国历史也不可能是我们美国历史的改头换面。如果认为中国妇女运动尚处在初创时期，比美国妇女运动足足落后 30 年，那是对中国妇女的莫大亵渎，也会使读者误入歧途。事实上，80 年代中国妇女的状况与 50 年代美国妇女的状况大相径庭。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要在 2000 年前实现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规划，而在西方，这一系列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则要长得多。中国妇女需要一下子承受当年工业革命、19 世纪末城市化、几次世界大战乃至女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变革给西方妇女带来的全部变化和压力，她们需要扬弃西方各个历史时期杰出妇女——诸如维多利亚女王、女铆工罗西、女编辑海伦·戈雷·布朗等——庞杂的思想传统。毫不奇怪，有复杂传统和灾难深重历史的中国妇女，正以一种独有的复杂心理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有几分执迷，又有几分疑惑，还夹杂有几分谨小慎微。对有些变化她们双手赞成，对另一些变化则顺其自然，但当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比如：招工的某些做法使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她们则奋起抗争，寸步不让。因此，她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是其他国家妇女经历的简单重复。

资料来源及范围 本书每章专门论述妇女生活的一个侧面。80 年代曾就这些问题发生过争议或力图加以扭转。每章后附有中国报刊杂志上刊载的讨论文章的译文，可供读者追忆当年争论之余韵。本书的研究资料选自 1979 年至 1986 年间的期刊、专为女性读者撰写的书籍以及此间的采访记录。

中国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始于 70 年代末，首先由官方报刊发起，主要有《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妇女》。迄至 80 年代中

期，许多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报纸杂志也加入了讨论的行列。这些报刊大部分是新办的，对它们的发行量、读者群及生存期我们都知之甚少。但是只要你留心一下市区或者甚至市郊的报刊销售亭，就会发现这些杂志依然蒸蒸日上，畅销各地。其中许多杂志，如《女子世界》《家庭》和《女友》等，都各有其固定女性读者群。1979年后，大量关于私生活的书籍得以出版，其中许多是给青年人提供咨询的。与期刊相比，这些书的基调则比较一致、谨慎，并且多半采用回答来信的方式。和报刊上复杂、详尽的读者来信有所不同，这类书籍中的信函一般都很简短，而且多采用程式设计，从大部分情况看来，那些问题和答复均出于一人之手。这些书有助于我们分辨哪些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认为要下功夫去加以解决的。

中国的新闻界是受国家控制的。因此，关于妇女生活的问题之所以能刊登在报刊上，至少部分地说明国家对这些问题很关心。然而，官方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并不意味着政府及党的领导已胸有成竹，并有了一套明确的政策。80年代国家权力下放，放松了对许多领域的控制，诸如经济规划、择偶、服饰等。虽然报纸不大可能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但多数妇女问题并不属于新闻检查范围。而且官方报刊上的文章还透露出这样的观点：即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无须受国家实行的“正确路线”的限制。况且，官员们毕竟对于许多个人生活问题不甚了解，没有多少发言权。相反，妇女和青年读物倒可指点迷津，拨云见日。毫无疑问，国家控制的报纸编辑们总认为他们的文章给人以教益，然而，他们在这些教益的具体内容上的意见往往不一致。

官方报纸读者们的观点也是五花八门。他们给报纸的专栏编辑写信，倾诉个人的苦衷，期待给以指点。而这些专栏作家

所采取的办法往往是鼓励公众参加讨论，并把部分讨论结果刊载出来。在这样的讨论中，公众的观点通常多有相左。如此众说纷纭表明青年读者对妇女问题既兴趣盎然又迷惘彷徨。不过，看来读者们普遍认为，某些做法在社会上是可行的，而另一些则行不通。但社会对这些做法的接受程度究竟有多大，他们则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编辑与读者往往观点相左，无法调和。

报刊上的争论渐渐渗透到人们私下的交谈之中，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议论私生活的种种问题。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讳莫如深的。本书两位作者1979—1981年间曾住在中国，此后又频频回访。据我们观察以及同中国朋友的私下交谈，发现我们在报刊上读到的问题也恰恰是老相识们所关心的热门话题。例如，当一位名叫遇罗锦的妇女发表了一篇记述她自己爱情、婚姻及离婚经历的文章后，立即在大学生中引起了极大轰动。刊载这一报导的杂志一出版便销售一空，大学生们不上课、不做作业，争相传阅。听着朋友们为这篇文章争得难分难解，我们意识到有两件事情已初露端倪：其一是一场涉及社会习俗和个人准则的争论已经开始，这场争论将对妇女产生深刻影响；其二是过去常为人们忽视的妇女生活的许多侧面现在已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对我们本人及我们的朋友来说都是第一次。

我们的几位朋友都年方二十，有文化，尚未结婚，都是70年代末经过严格考试进入大学的。她们上学前大都在农村或工厂工作过多年。我们也和那些年长的妇女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她们解放前上过大学，解放后那些风云多变的日子里，她们一直对妇女问题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以上这些妇女都是城市知识分子，她们的观点在许多方面并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全部。但我

们即使十分有限的调查也足以说明，报刊上的争论并非脱离大众、无的放矢的高谈阔论。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城市妇女的。虽然她们在数量上有1亿之众，但在全国的妇女人口中仅仅占1/5。她们既是新办妇女报刊的读者，许多人同时也是作者，而我们的许多资料恰恰来源于此。因此，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出版物，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由于几个关键的妇女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所以报刊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用农村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父母干涉子女婚姻问题、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溺杀女婴、家庭暴力等。这些讨论本书均已收入，但可惜我们不能就读到的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就使我们处于极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花了大量篇幅用来描述中国妇女的少数；另一方面，对于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妇女则如雾中看花、一鳞半爪，而且提了许多本书无法回答的问题。由于书面资料有限，又不可能在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只好望洋兴叹。中国农村妇女问题极其重要，不可忽视，但有关她们经历的详尽研究只能由将来有机会住在中国农村的人们去完成了。

由于这本书是按照我们俩人的问题和现成的答案设计完成的，因此，在此有必要陈述一下我们两位作者的浅陋之见。我们俩是以美国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妇女研究工作的，因此，必然受到特定的专业训练和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限制。我们的分析框架与中国同仁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首先，我们继承了先前研究中国妇女的西方学者的思想传统。这些西方学者中，有的是从中国报刊上找线索，梳理出官方政策的；而另一些则在台湾、香港及中国大陆进行采访，从民族志角度研究的。因此，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工作使我们得以把这些争论